

南洋散文的「離散中國」及其世代斷裂

張彥涵

（馬來亞大學中文系博士）

前言

本文以《南洋散文集》與《南洋青年散文集》為研究對象，探索二戰後至獨立前（1946-1953）馬華散文中的家園意識在不同世代之間發生的變化。本文並不意圖以兩部選集概括戰後馬華文學的整體面貌，而是將其視為有代表性的文本切片，通過細讀分析，揭示不同世代對於離散家園意識上的結構性差異。作為戰後的重要選集，《南洋散文集》不僅反映了特定時代的意識形態潛流，也為觀察離散家園意識的持續性提供了關鍵文本窗口。現有論述多將戰後馬華文學中的家園意識理解為由「中國」向「南洋」的線性轉型，然而本文所關注的是這一認同模式在不同世代之間是否真正得到延續。

具體而言，《南洋散文集》延續了以中國為想像家園的認同

結構，反復書寫「返歸祖國」（中國）的願望；相較之下，《南洋青年散文集》中的青年書寫則明顯弱化了「中國」的情感單位，其關注重心更傾向於青年關注的個人生活與情感經驗。因此本文所提出的「家園意識轉型」，應理解為在特定文本與歷史條件下浮現的一種趨勢，而非對整體文學實踐的普遍路徑。離散的家園意識並未在不同時代之間延續，「祖國」在青年的散文書寫中出現顯著弱化甚至趨向消隱，對中國的「沈默」本身便構成重要證據，「家園」、「故鄉」、「祖國」不再作為需要被反復指認的對象，而是自然而然地內嵌於在地經驗之中。隨著世代更替，以「祖國」（中國）為核心的認同模式逐漸失去其解釋力，而讓位於以在地生活為基礎的經驗結構。

一、「家園」的流變

日本入侵之後，生存作為優先事項構成戰爭時期散文最重要的主題轉向之一。文本關注由祖國想像轉向個人／群體經驗，使南洋逐漸被視為一個承載風險、照護與責任的現實空間。這一變化為戰後家園意識的重組提供了重要依據。鍾怡雯在〈下南洋，返唐山——《南洋散文集》的移民史縮影〉中指出，戰爭時期出版中斷影響了選集的構成。（鍾怡雯，2017年第6期）戰後的復原以及個體的心理調適都需要時間。這部由一群知識分子悉心保存並加以出版的數量僅為三十四篇的散文選集，得以為我們提供一個罕見卻極具價值的切入點，得以窺見當時圍繞「家園／故

鄉」所形成的主導意識形態。儘管篇幅數量有限，這些散文仍為理解當時人們如何感知並表述其「家園」意識，提供了關鍵性的線索。

由韓萌（1922-2007）主編的《南洋散文集》所呈現的，是以中國為核心的離散意識。韓萌雖出生於南洋，但其成長與思想形成主要發生於中國，這種跨地域經驗使其編輯立場更接近「中國知識分子看南洋」。選集中多篇作品流露出對中國的懷舊情感，並將其視為唯一的「祖國」，而南洋則被經驗為過渡性或異鄉空間。這種跨地域的「兩鄉經驗」，可說是影響了編輯立場的原因之一（鍾怡雯，2017年第6期）；相較之下，《南洋青年散文集》則明顯弱化中國指向，轉而聚焦戰後南洋青年的現實處境，如經濟壓力、教育中斷與生活焦慮。這一轉向顯示，家園意識已由對祖源的指認，轉向在地經驗的內化，南洋逐漸成為不證自明的生活依據。

相對《南洋散文集》而言的《南洋青年散文集》，很少著墨「祖國」或「故鄉」，對中國的嚮往在當時年輕一代的意識形態中似乎無關緊要。《南洋青年散文集》中，阿興的〈阿偉的淘金夢〉裡有寫道：「在家鄉的時候，阿偉哥因為受到親戚們的慫恿，說南洋地方怎麼好！生活多安適、工作多輕鬆，而且處處有發財的機會。這些甜言蜜語感動了他的心，於是他便掀起了到南洋淘金的美夢。經過了許多麻煩的手續，坐著帆船，乘風破浪，辛辛苦苦地抵達這所謂的『淘金地』南洋。」（有興，1950）因為「這裡並沒有遍地的黃金，一切的一切，都比那多山川河流的

美麗祖國還遜色呢！於是他失望了，再加上離鄉背井的不安心情，和對異地的生疏，人種語言的複雜，使他陷入空虛渺茫的境遇中」（有興，1950），迫使阿偉「除了他手上從祖國帶出的一隻小戒指外，沒增加一釐半毫」（有興，1950）。過了五年，生活還是依舊潦倒，使得阿偉進退兩難，想回到自己的祖國（中國），卻只能夠滯留在南洋。文本揭示了一個現實問題：南洋等同於過渡空間的想像與現實落差，使「回歸中國」成為持續卻無法實現的願望。

兩部選集中關於家園的故鄉意識並置，揭示了戰後馬華散文的分化路徑：前者延續以中國為中心的離散認同，後者以內嵌於南洋現實的在地經驗為書寫核心。這不僅體現了不同世代作家的生命經驗差異，更標誌著馬華文學中「家園意識」在不同的世代之間出現結構性斷裂：早期作家群以中國為中心的家園離散取向，而戰後文本中逐漸出現以南洋為家園的定位轉向。這一現象，在《南洋散文集》中有關家園書寫的選文，表現得尤為明顯；而青年世代則將關注轉向在地經驗與個人發展，對中國的離散情感顯著減弱，甚至趨於消弭，使「中國」不再構成情感認同的必要參照。這一差異與戰爭經驗密切相關。戰爭強化了上一代作家對中國的情感連結，從而鞏固其離散認同結構；相較之下，成長於戰爭之中或戰後的青年世代，更直接面對社會現實與未來處境，使其書寫多轉向在地經驗或個人情感的抒發。

二、離散中國的書寫

《南洋散文集》以郁達夫於 1941 年創作的〈馬六甲記游〉開篇，該文是選集中唯一一篇戰前作品。郁達夫的〈馬六甲記游〉以第一人稱視角書寫，作者以一名外來觀察者與訪客的身份展開敘述。在行文過程中，郁達夫多次傳達出其在異地旅行時所感受到的疏離感與日益加重的倦怠情緒。他將自己在馬六甲生活與工作的經歷描述為一種折磨，指出：「生活在終年如夏、沒有季節變化的南洋，人們的記憶會像一張陳舊的照片一樣逐漸褪色。」（郁達夫，1941, 1950）在缺乏季節變化的南洋空間中，衍生出對南洋的疏離感，他逐漸喪失了對時間的感知，從而產生持續性的疲憊與陌生感，也對南洋的隔閡加深、對「返回中國」的渴望埋下了伏筆。郁達夫深切地寫道：「午夜時分，疲憊旅人的深沈悲哀，忽然在返回旅舍的汽車窗外顯現出來，彷彿是在遠方的飛機或火車上，偶然瞥見一位陌生的旅伴。這種久已不在我心中的感覺，正是午夜時分疲憊靈魂的憂傷。」（郁達夫，1941, 1950）這段文字凸顯了他強烈的家園錯位，以及對熟悉的時間與空間標記所懷有的憂鬱鄉愁，反映出這一時期南洋華僑所共同經歷的離散經驗的主題。例如：「那些古樸而精緻的南洋亞答屋，配以椰樹投下的斑駁樹影，以及其間橫跨的小橋，清楚地顯示出我正行走在南洋的鄉村之中。然而，車輛一轉，駛入平原地帶，天空驟然開闊，稻田裡一片翠綠的稻稈映入眼簾，在高大樹木的陰影下，幾位膚色黝黑的農人靜靜歇息。這一景象再次使

我聯想到故鄉江南廣袤的田野。」（郁達夫，1941, 1950）郁達夫以一位「疲憊的旅人」的形象自居，坦率地揭示了自己在長期遊歷南洋之後所產生的思鄉之情。他明確指出所謂的「故鄉」就是「中國江南廣袤的田野」。這種敘述方式與一般的遊記書寫略有不同。通常而言，遊記多以毫無保留的讚嘆來描繪旅途中所見的風景與經歷，郁達夫卻藉由南洋的獨特景觀，不斷喚起對中國的記憶。南洋景觀並未理所當然地生成在地認同，反而持續觸發他對中國的歸屬感與美好記憶，使得心裡的「家園」始終指向遙遠的北方。

蕭天於 1945 年寫成的〈夜笛〉（蕭天，1945, 1950）通過戰爭廢墟與「無法回家」的意象，呈現出極端恐懼的心境之下，對於渴望回到中國的感受。戰爭不僅製造死亡與恐懼，也中斷了返回祖國的可能，使「回家」成為一種被延宕甚至不可實現的願望。這類書寫揭示了南洋並未被視為妥妥的「家園」，而是一個被動的滯留空間。這種以中國為中心的離散認同，並未在青年時代中獲得延續；而《南洋青年散文集》呈現出截然不同的書寫取向。張復靈在序言中將作品比喻為「原野上的小草」（張復靈，1952）強調選文尚未成熟卻富於生命力的特質，顯示其編纂偏向日常經驗，而非建構宏大的民族文化敘事。在具體文本中，青年作者多聚焦升學、家庭壓力與現實困境，即便涉及南洋，也主要圍繞謀生與適應問題進行闡述，而非祖國想像或返歸願望。家園不再作為明確對象出現，而內嵌於日常生活之中。

綜上，《南洋散文集》與《南洋青年散文集》之間的差異，

並非單純的認同轉移，而是揭示了離散家園意識在世代之間的結構性斷裂：中國不再構成青年時代必要的情感歸屬或使命感的來源，離散意識在青年世代明顯弱化，甚至逐漸失去其表述「中國」為「家園」的必要性，離散情感顯著減弱，甚至不再構成書寫核心。

三、離散家園的世代分裂

在《南洋散文集》所收錄的作品中，幾篇作品反復表達返歸祖國的願望，進一步強化了對中國持續不變的思念情感。葉劍平在〈覺醒〉中回憶其表兄在夜晚所說的話：「只要中南航線一通，我馬上就回唐山」（葉劍平，1950）。同樣，辛志在〈富良江畔的種子——懷念寒江〉一文中寫道：「我在安南還有一個家。我的家在向我招手，我終究還是要回去的。」（辛芷，1946, 1950）潘君在〈騎樓下的寫信先生〉中亦表達了相同的情感：「朋友們，你們還年輕，將來一定要回到祖國去！」（潘君，1950）這些反復出現的表述，直接證明了「返歸祖國」是持續性的集體情感，顯示「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仍舊是最穩固的情感歸屬。

除了部分作品體現了一些南洋華僑將南洋視為短暫的避風港及過渡空間之外，同時也存在幾篇將南洋視為「家」的文章，在南洋落地生根的想法保持低調，不直接說明家園的轉變，而是以文章的敘述主體來轉述觀點。例如陳言〈善變的人〉是一篇少見

地融入幽默與諷刺元素的文本。作品的核心人物王立志，人稱「老王」，是一位生活在南洋的小土地業主。儘管他屢次宣稱自己決意返回中國，但他對南洋情人「羅小姐」的情感依附，卻始終使其計劃無法付諸實行。在言談之中，王立志常常高聲表明自己要「回祖國」的決心；然而在實際行動上，他卻一次次未能兌現這些宣言。在陳言這位外來觀察者的筆下，這種反復猶疑的狀態既令人發笑，也頗具揭示意義。老王在「回祖國（中國）」的集體期待與南洋的情感生活之間徘徊，顯示出家園定位的內在分裂。「回中國」在戰爭之後不再是唯一選項。

敘述將老王刻畫為一個思緒搖擺不定的人物，深陷於理性責任與情感慾望之間的內在掙扎之中。一方面，他感受到「回家報國（中國）」的集體期待與道德壓力；另一方面，他又沈溺於愛情之中，不願捨棄私人情感所帶來的溫暖。陳言以敏銳的洞察力描寫了這一內心衝突：「我可以感受到，他的情感與理性正在進行一場激烈的搏鬥——相互轟擊、彼此反擊：家庭與情人，前進與後退……一連串的問題不斷折磨著他。他一方面渴望前進，想要自由地在天空中飛翔；然而另一方面，卻彷彿有一隻無形的巨手將他牢牢拉住、束縛著，使他無法掙脫。」（陳言，1950）此處，「一隻無形的巨手」的隱喻象徵著愛情的牽引可能產生「落地生根」的想法；儘管他內心懷有報效祖國的願望，這股力量仍將他牢牢牽制。這一描寫凸顯了南洋獨立前部分海外華人所面臨的一種新困境：一方面是與中國相連的集體理想與情感指向，另一方面則是出於現實考量而選擇留在南洋、經營個人生活的實際

需求。陳言散文中所採用的幽默語調，進一步展示了這一微妙卻意義重大的轉變。老王的善變被描繪得頗具親和力，然而在幽默表層之下，卻蘊含著更深層的文化評述。陳言〈善變的人〉顯示，返歸中國雖仍具道德壓力與集體正當性，卻已不再是唯一選擇。老王在「回祖國」的理想與南洋的情感生活之間徘徊，說明家園認同已出現內部分裂。

此外，選集中部分散文也呈現出無意識的「家園轉向」——從日常口語及生活習慣與中國對比，明顯突出「南洋風格」的基調。在黎田的〈山芭校長〉中，人物老吳在書寫過程中逐漸吸納了南洋的語言特徵：「在過去的一年裡，他學到了許多新的知識與技能。一年前，學校裡常見的文言虛詞『之乎者也』，如今在他的書信中，已被諸如『了的嗎呢』之類的口語表達所取代。」

（黎田，1950）「之乎者也」代表的是古典漢語中常見的文言虛詞用法，而「了的嗎呢」則是南洋華人日常口語中常用的語氣助詞。這種由文言虛詞轉向南洋口語助詞的變化，顯露出一種新生的混雜性（hybridity），也是作者暗示南洋僑民無意識的「在地化」過程。即使人物在情感上仍心繫中國，其書寫語言卻已經以一種**委婉的方式表達對南洋在地生活的適應**，從而暴露家園認同的潛在位移。正也恰恰印證何國忠的觀察：「南洋華人正開始尋找他們新的身份，儘管許多知識分子或作家自身可能尚未意識到這一變化。」（何國忠，2002）事實上，如老吳這類對中國懷有深厚情感的人物，往往並未察覺自身文化定位所發生的細微轉移，已悄然顯露出對南洋的新一層情感依附。

與〈善變的人〉中的老王主動在南洋經營情感與生活不同，〈山芭校長〉中的核心人物老吳，更接近一種無意識的在地化：其家園定位仍舊向中國傾斜，但語言與生活形式已逐漸被南洋同化。前者對於駐扎南洋存在某種離散情緒，後者則是心甘情願在南洋落地生根，並且隱約透露充滿對新生活的期待與喜悅。兩者處境明顯不同：前者象徵在南洋艱難掙扎的人物具有南洋語言文的代表的是一位已然安頓下來的華人，後者則在擁有相對穩定生活基礎的前提下，愛情在其人生中扮演著一種「潤滑劑」的角色，使「回中國」退居為次要關切。由此可見，這一時期部分南洋華僑選擇在南洋扎根，其根本原因並不在於是否返回中國，而在於不斷尋找「留下來」的理由。這一點在王某的話語中得到了簡潔的概括：「回不回中國都無所謂，只要我下定決心，照樣可以上進，不是嗎？」（陳言，1950）隨即，他又以一種輕鬆愉快的神情，熱情地摟住妻子並比劃著說道：「來，什麼時候到我家坐坐！不，是甜窩，來我們這甜窩裡玩玩吧！」（陳言，1950）王某看來，「回祖國」並非個人進步的唯一途徑，這也暗示了他早年觀念中的某種狹隘性。

此外，作品中特別強調其婚姻中的「家」為「甜窩」（陳言，1950），這一稱謂相較於一般的「家」或「家園」，更具親密性與情感層次。這表明，那些選擇留下的華人已在南洋扎根，並主動放棄了返回中國的可能性，將情感與忠誠投注於南洋土地之上，甚至將南洋視為最終的歸屬。然而，從韓萌的編輯立場來看，這種呈現更像是隱含的抗議。王某「善變」的性格被描繪得

親切而富有幽默感，他選擇留在南洋而非返回中國，被刻畫成一個只為個人成長而忽略「返國使命」的人物。老王將重心從「祖國」（中國）轉移到南洋的「甜窩」，不僅反映了其價值取向的變化，也折射出華人離散群體中更為廣泛的一種趨勢——在新的環境中安頓下來並逐步融入其中。這種敘事雖然帶有幽默色彩，也可被解讀為對以個人滿足取代愛國理想的一種含蓄批評。

〈山芭校長〉中的老吳是一位博學之士。儘管其情感仍然繫於中國，早已察覺到自己的語言被南洋「同化」。他們經常表達返回中國的願望（或許已成為一種慣性表述），但在心理與意識形態層面，他們實際上已開始將南洋視為真正的家園。無論是韓萌，還是那位心系中國的〈山芭校長〉主人公，都未曾察覺自身土地認同所發生的變化。在潘君的〈騎樓下的寫信先生〉中，主人公——那位代人寫信的先生——為許多人撰寫過書信，其中卻有一位老者在其信中講述了最為悲傷的故事：

唉！南洋哪裡是什麼好地方！朋友啊，我恐怕這一輩子就要耗在這裡了。我的祖輩曾在荷蘭統治下的爪哇做小生意，聽說那時的日子還算不錯，於是我滿懷希望，千里迢迢地前來。然而，到了這裡之後，連我自己也說不清緣由，前往荷屬地區的入境證件卻始終無法辦成，於是便滯留在新加坡。心裡想著，也罷，新加坡也還可以吧。唉！就這樣，我一直留在了這個所謂的「好地方」。（潘君，1950）

「好地方」一詞實際上帶有反諷意味，因為在他看來，南洋根本

算不上什麼好地方。本文描繪了一位並不情願留在南洋的老人，他並不熱愛這片赤道之地；對於那些長期居住在南洋的人而言，他所感受到的更多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處境。潘君也對這位貧困老人的思鄉之情做了評論：「他們思念自己的祖國（中國）……他們的祖國或許貧窮，但終究比在異鄉（南洋）遭受迫害要好得多。」（潘君，1950）這位老人將返歸故土的希望寄託於年輕一代之上。他對中國懷有深切的嚮往，並將其視為真正的家園，僅將南洋看作流放之地。儘管內心充滿輕蔑與排斥，但現實條件卻迫使他滯留於此，只能在精神層面進行自我安慰。諸如〈騎樓下的寫信先生〉之類作品，都進一步強化了第一代移民將南洋視為流放地、承受著對中國強烈而持久的鄉愁；而在南洋出生、成長的後代，則已開始在地扎根，逐步將南洋視為真正的家園。

這些敘事呈現出兩種彼此區分、且在某些時刻相互衝突的傾向。一方面，許多作家表達了堅定不移的返歸中國之決心，將中國視為真正的祖源家園與忠誠的最終歸屬；另一方面，一種逐漸成形的認知也開始浮現——南洋不再僅僅被視為暫時停留之地，而是可能成為永久性的家園。這種「祖國」與「家園」之間的二元區分，反映了海外華人社群多樣而複雜的個人與集體經驗，這些經驗既受到具體社會—政治條件的形塑，也深受戰爭動蕩與殖民統治體制的影響。

從 1940 年代後期至獨立前夕，散文日益為集體性的「我們」發聲，從懷舊轉向扎根、從移民的暫居意識邁向地方未來的想像。儘管 1947 年的公民身份辯論在實踐層面受限，但這一限

制卻開啓了華人可能作為「本地人」而非永遠的客居者的政治身分想像。這時期的作家群將散文通過從回憶走向重建、從對中國的遙遠忠誠，轉向近身對南洋的責任這一轉變。這並非簡單的同化，而是一種在保存語言文化根源的同時，吸納熱帶節律、馬來語詞彙、英文教育與多族互動的在地文化自覺。

總體而言，《南洋散文集》中對中國的家園書寫並非只採取單一的離散機制，「中國」在某些情況下仍被反覆建構為祖源家園；另一方面，南洋已在情感、語言與生活層面逐漸成為可能的歸屬空間。正是在這種內部張力之中，離散家園意識開始鬆動，並為後來青年世代中更顯著的世代斷裂埋下伏筆。

四、家園認同的世代差別

通過前述文本分析，可以進一步指出家園認同在不同世代之間呈現出結構性的差異。《南洋散文集》集中體現了戰前與戰時作家典型的「中國取向」情感。如鍾怡雯所言，許多移民「南下是為了北歸」，即便未能成行，情感忠誠仍然指向中國。（鍾怡雯，2017 年第 6 期）在這一書寫框架中，中國被建構為唯一的「家」，而南洋則多被經驗為試煉之地、過渡空間，甚至帶有流放意味。相關作品如〈驗糞——中國人民出國的經歷〉與〈善變的人〉，從歷史角度看，那些被視為「善變」的選擇，實為早期扎根意識的顯現，皆在個人敘事層面呈現出身份認同的臨界狀態，一方面維繫對祖國的情感忠誠，另一方面則逐漸面對在南洋

落地生存的現實。

這一差異可通過具體文本進一步說明。例如在部分青年的書寫中，即使涉及南洋經驗，也多圍繞謀生困境與現實適應展開，而非延續「返歸中國」的敘述邏輯。即便出現對中國的提及，其情感強度與敘事位置亦明顯弱化，未再構成書寫的中心動力。這種「相對沉默」本身，反而成為理解世代差異的重要線索：當中國不再被持續言說，它便不再是必須被確認的家園對象。

在世代轉型之外，文本中也可觀察到另一種更為細微但關鍵的變化，即家園認同的「經驗化」。如馬寧對於日常生活中「沖涼」的描寫，呈現出主體在熱帶環境中的逐步適應過程：從最初的不適與抗拒，到習慣與日常化，最終轉化為感官層面的自然經驗。這一過程不僅涉及生理層面的調適，更體現了一種認同的內化機制。南洋不再只是外在的地理空間，而是通過身體經驗被持續實踐、感知與確認的生活場域。

《南洋青年散文集》所呈現的書寫重心明顯轉移。本地出生或成長的青年作者，較少直接言說「家園」或「祖國」，其關注焦點轉向友誼（如李可人〈失學記〉、李生申〈山遙水遠人何在〉）、早婚與升學之間的角力（如葉憎〈倔強的人〉、趙明文〈失學記〉、化人〈一本詩集〉、麥山鄉〈長夜漫漫何時旦〉），南洋的日常（如李浪花〈「某老闆是我的阿舅」〉、李培和〈百字夢〉、鄭翼霖〈美麗的回憶〉、嚴然〈烙印〉），與長輩的文化記憶與祖源想像為核心的家園認同存在差異，青年世代的書寫更傾向於通過日常經驗與身體實踐來建構歸屬。這種轉

向並非簡單的認同替代，而是標誌著家園意識在表達層面與感知結構上的轉型：從被言說的對象，轉向生活的現實。只有極少數的篇章想像日本侵略南洋的場面（映清〈不平凡的傷痕〉）等經驗。這一現象並不意味著家園意識的消失，而是顯示出其表達方式的轉變：家園不再作為被反復申述的對象，而是以內嵌於生活實踐之中的方式存在。換言之，對於青年世代而言，**南洋已成為無需論證的生活前提**。

綜合來看，兩部選集所呈現的差異，不僅體現為「中國」與「南洋」的空間轉移，更反映出家園認同在不同世代之間的表達機制與感知方式的變化。前一世代通過不斷言說「回歸」來維繫離散認同，而青年世代則在不言之中完成了在地歸屬的確立。這種由「言說」轉向「實踐」的變化，構成理解戰後馬華散文世代差異的重要切入點。

結 論

戰爭、殖民重組與戰後社會變遷，共同構成馬華散文中家園意識變化的重要歷史條件。通過《南洋散文集》與《南洋青年散文集》的比對閱讀可以發現，二戰後至獨立前的南洋華文散文，呈現出以中國為中心的離散認同，從「家園意識轉型」逐步轉向以南洋為基礎的在地歸屬的趨勢。這一轉型並非線性延續，而是在不同世代之間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差異。具體而言，《南洋散文集》所代表的早期世代，仍以中國作為想像家園，反覆書寫

「返歸祖國」的情感結構；而《南洋青年散文集》中的青年作者，兩部文集構成了分析戰後馬華文學中家園意識變動的關鍵文本場域。它不僅反映了其所處時代的意識形態潛流，也呈現了南洋華文作家身份認同意識的流變。

在世代差異之外，文本中亦呈現出一種更為內在的轉向，即家園認同的「身體化」。如馬寧對「沖涼」的描寫，展現出主體在熱帶環境中由不適到適應的過程。這一變化不僅是生理層面的調節，更體現為認同在感官層面的內化。南洋不再僅僅作為外在的地理空間存在，而是在日常身體實踐中被持續經驗與確認。在此意義上，家園不再依賴抽象的祖源想像，而是通過生活的重複性實踐被具體化與自然化。這種由「文化認同」向「身體經驗」（張復靈，1952）的轉移，標誌著家園意識在感知結構上的深層變化。

在形式層面，這種「生存優先」的轉向拓展了散文的表現譜系。戰前散文多以田園回憶或面向中國的愛國激情為主，而戰時作品則轉向記錄匱乏、恐懼與即興應變。這一變化並未削弱文學價值，而是重新定義了審美標準，使細節、見證與個人、甚至族群經驗為表達基礎。散文由此呈現出一種「生存體裁」的特徵，記錄了作家群在極端的歷史條件下的感知、承受與心理變化。

相較於偏重中國情懷的早期選集，《南洋青年散文集》突出青年的在地經驗，如友誼、課堂、家庭摩擦與初戀情懷。缺乏明確「家園」話語，並非表示青年世代對「返歸中國」冷漠，而是對這一世代而言，「南洋就是家園」已是不言自明的意識存在。

校園散文、日記式書寫與日常挫折的描繪，自行完成了家園定位的邊界建構，將歸屬家園的現實主義中心悄然轉移至個人主義當中。

縱觀戰前、戰時與戰後階段，南洋華文散文呈現出從中國中心的嚮往，轉向以生存為錨的在地性，再發展為南洋的集體歸屬。這些並非截然分離的階段，而是層疊、交錯的取向。看似意識形態的轉變，實則亦是世代更替的結果。未經歷「南下再北歸」邏輯的青年作家，書寫出一種不自覺的扎根狀態。整體而言，這一文本群不僅記錄個體聲音，更構成一部集體身份轉型的檔案，展示「家」如何在危機與重建中重新錨定。

綜上，筆者認為「離散」並非一個穩定且普遍適用的認同模式，而應該是一種在特定歷史條件與世代經驗中生成的情感。長期以來，「離散的中國」或「離散的馬來亞」往往被視為連續性的認同模式（把某種「離散」理解為「可穩定從一代人傳遞到下一代人」的繼承性結構），然而這一理解忽略了不同世代之間在經驗結構與情感指向上的顯著差異。

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既有研究在無形中形成了一種分析盲點：即未能充分納入世代視角，高估了離散認同的延續性。通過對兩部選集的對比閱讀可以發現，離散並未在世代之間穩定傳遞，而是在具體語境中發生鬆動、轉化，甚至被重新組織。這一發現提示我們，有必要在離散研究中重新引入世代維度，以更準確地理解家園認同的歷史變動。

參考文獻

- 鍾怡雯. (2017 年第 6 期). 《下南洋，返唐山——〈南洋散文集〉的移民史縮影》. 《外國文學研究》，頁 169.
- 有興. (1950). 〈阿偉的淘金夢〉. 於 張復靈, 《南洋青年散文集》 (頁 42). 檳城: 馬來亞週刊出版社.
- 葉劍平. (1950). 〈覺醒〉. 於 韓萌, 《南洋散文集》 (頁 66). 香港: 務實出版社.
- 潘君. (1950). 〈騎樓下的先生〉. 於 韓萌, 《南洋散文集》 (頁 159). 香港: 務實出版社.
- 陳言. (1950). 〈善變的人〉. 於 韓萌, 《南洋散文集》 (頁 118–119). 香港: 務實出版社.
- 黎田. (1950). 〈山芭校長〉. 於 韓萌, 《南洋散文集》 (頁 132). 香港: 務實出版社.
- 張復靈. (1952). 〈序〉. 於 張復靈, 《序言·南洋青年散文集》 (頁 3). 檳城: 馬來亞週刊出版社.
- 何國忠. (2002). 〈中國意識與本土意識的消長〉. 於 何國忠, 《馬來西亞華人：身份認同、文化與族群政治》，*Malaysian Chinese: Identity, Culture and Ethnic Conflict*. (頁 35). 吉隆坡: 華社研究中心.
- 蕭天. (1945,1950). 〈夜笛〉. 於 韓萌, 《南洋散文集》 (頁 101). 香港: 求實出版社.
- 辛芷. (1946,1950). 〈富良江畔的種子——懷念寒江〉. 於 韓萌,

《南洋散文集》（頁 93）。香港：務實出版社。

郁達夫。（1941,1950）。〈馬六甲記游〉。於 韓萌，《南洋散文集》
（頁 5）。香港：求實出版社。

[完稿 2025；修訂 2026]